

## 壹、緒論

1945年11月16日，37個國家簽署《聯合國教育、科學及文化組織章程》(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,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)，簽署各國共同宣言聲稱，由於戰爭起自人心，也因而只有在人心之中才能建構和平堡壘。完全靠各國政府間政治、經濟的安排為基礎的和平，難以獲得世界各國人民一致、永續而真誠的支持。真正的和平必須建基在全體人類知識和道德上的凝聚與團結。為臻於此，必須提供所有人民完全而平等教育機會才有可能 (UNESCO, 2004: 7-8)。

戰爭起自人心，政府基於利害考量所為之措施，難以保證和平與團結的理念，可以遠溯西元前5世紀的墨子（約468~376 B.C.）也有類似的主張。墨子在〈兼愛篇〉中即指出：

今諸侯獨知愛其國，不愛人之國，是以不憚舉其國，以攻人之國。今家主獨知愛其家，而不愛人之家，是以不憚舉其家，以篡人之家。今人獨知愛其身，不愛人之身，是以不憚舉其身，以賊人之身。

爲了避免天下之人，只愛自身，不愛他人所引起的「疆必執弱，富必侮貧，貴必傲賤，詐必欺愚」等「天下禍篡怨恨」，必須「兼相愛，交相利」。愛人者，人恆愛之，利人者人恆利之。這個「兼相愛，交相利」，兩得其愛，兩得其利的道理非常簡單，但付諸實踐仍有困難。正如墨子所說：「特上弗以爲政，士不以爲行故也」，主政者既未持以爲施政政策，一般老百姓也就未將之付諸日常生活實踐，難怪乎徵諸中西史實，戰爭從未間斷；戰爭之後，才會有對戰爭以及人性深層反省。古希臘哲學家 Heracles（約西元前5世紀）即曾言之：「戰爭是萬事萬物之共同原理，正義即由爭鬥而生」(Diels & Kranz, 1951: Heracl. B80) 人與人之爭，國與國之戰既未能完全避免，勢須有制度化的組織來從事人與人之互相瞭解與

相互扶持。國際教育的理念與制度因而產生，遠如希臘化時期斯多噶學派（Stoicism）的世界主義（cosmopolitanism）、17世紀J. A. Comenius（1592-1670）的泛智教育（Pampaideia）及光明學院（Collegium Lucis）與康德（I. Kant）的永久和平論；近如國際聯盟（The League of Nations）、國際教育局（The International Bureau of Education）和聯合國教育、科學及文化組織（United Nations Education,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, UNESCO）等國際組織所附設的文教組織及其活動大多本於教育，為促進人性自省，導向相互瞭解，進而建構公平、正義及永續發展社會之重要途徑的哲學理念。很可惜當前對國際教育的研究文獻，大多偏於國際教育組織之制度與措施層面的探討，甚少深入分析制度背後的哲學理念（楊深坑，2012：22-50）。有鑑於此，本文試圖從歷史發展的角度，深入分析國際教育制度的理念基礎、當前狀況與未來的可能發展，據以擬具建議，以為規劃我國合宜國際教育措施之參考。

## 貳、國際教育的理論先驅

「國際教育」（international education）一詞，正如Cambridge與Thompson（2004）的分析，意義常因使用方式不同，而有不同的涵意，歸納而言，主要有三種涵意：促進國際瞭解之哲學思辯與學術研究、培養國際眼光與國際心靈的教育，以及國際學校所提供的教育。本文的分析也將以這三個主軸論述國際教育之哲學理念、機構發展及未來展望。

國際教育與國際主義在19世紀初之前幾乎少為人所知，而在此之前較為人所知的是世界主義和普遍主義（universalism）這兩個語詞（Kleingeld & Brown, 2006）。世界主義的理念可以追溯到西元前五世紀的希臘犬儒學者Diogenes the Cynic（412或404～323 B.C.）。根據Diogenes Laertius《哲學家列傳的記載》，Diogenes the Cynic不僅主張最好的政體是世界主義的政體，甚至於主張公妻制度（Diogenes Laertius, 2001: 6-72）。

Diogenes the Cynic之世界主義的主張，透過Crates of Thebes（365～